

论《花与梦》的悲剧内核和叙事策略

仁青拉西

(西南民族大学, 四川省成都市, 610041; lx19130431356@qq.com)

摘 要: 在文学创作的广阔领域中, 乡村女性进城题材的小说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内涵, 成为反映社会变迁与人性挣扎的重要载体。这类小说聚焦于乡村女性在城市化进程中所经历的种种遭遇, 不仅展现了个体命运的跌宕起伏, 更映射出社会结构、文化观念等多层面的冲突与碰撞。本文以《花与梦》等作品为研究对象, 从悲剧性与叙事两个关键角度切入, 深入探究乡村女性在进城过程中的复杂境遇, 旨在揭示隐藏于文本背后的社会现实与人性本质, 为理解这一文学现象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

关键词: 《花与梦》; 悲剧内核; 叙事策略

引言

《花与梦》作为西藏首部由女性作家以母语创作的长篇小说, 在藏族文学史上意义非凡, 它填补了藏族文学史中女性长篇叙事的空白。作家次仁央吉历经七年构思创作, 凭借深厚的文学功底, 通过描绘四位农村女性从乡土迈向城市的迁徙轨迹, 真实地刻画了乡村女性进城后的命运走向, 细腻勾勒出她们在梦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中寻求自我救赎的精神图谱, 成为观察社会转型期底层群体精神嬗变的关键文本。这部作品的独特价值不仅体现在对物质层面生存困境的生动呈现, 更在于其以藏族文化语境为深厚底色, 深入挖掘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过程。主人公从“心怀梦想到痛苦挣扎, 从人生溃败到幡然醒悟”的命运沉浮, 既是对现代化浪潮下边缘群体生存状态的寓言式书写, 也是对藏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碰撞的深刻反思, 充分展现了文学介入社会现实的批判力度与人文温度。

1 《花与梦》的悲剧内核呈现

1.1 身份困境: 双重边缘人的尴尬处境

美国早期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提出的“镜中我”概念指出, 个体的自我观念源于与他人的交往, 是对他人评价的反映[1]。在乡村女性进城题材小说中, 如《花与梦》里的卓嘎、央宗、宗西、小莉, 她们作为城市的外来者和从事世俗认为不体面工作的临时工作者, 被排除在社会正常秩序之外。这种身处城市却无法融入的处境, 给她们带来了强烈的内心冲击, 产生了不被认同的尴尬与焦虑, 进而对城市身份产生了极度渴望。小说中央宗被误会离开县长家时, 卓嘎时髦的穿搭与狭窄阴暗的出租屋鲜明反差中, 构成了物质贫困与身份焦虑的视觉隐喻。她们虽经济实力有限, 却努力遵循城里人的审美和生活方式, 急切渴望融入城市圈子。小说中卓嘎生病后对于医生发自内心的羡慕可看出她所理想的城里人的身份, 而她们只能在最底层的工作中连轴转干着最脏最累的工作。自从在歌厅工作后收入明显比以前提高了, 但是她们认为终究是拿不出手不太体面的工作, 她们甚至怕邻居知道她们所从事的工作而从来不跟她们打招呼且没有交集, 且因晚上出去工作被邻居称为雕鸮(猫头鹰的一种), 这个称呼既可笑又可悲。她们虽生活在城市但是好像又没有被她们的城市梦给眷顾, 长此以往, 陷入了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 成为了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守着土地过安稳日子的农民, 又不能算得上真正被城市接纳、享受城市优质资源与社会福利, 完全融入城市

生活的城里人的“双重边缘人”。她们在城乡之间徘徊游离，找不到自己真正的归属，内心的孤独与迷茫与日俱增，也进一步加剧了她们命运的悲剧色彩。

1.2 双重枷锁：传统贞节与城市资本的合谋

在《花与梦》所勾勒的世界中，进城的藏族乡村女性，因自身所处环境的局限，无奈地将青春的身体当作获取生存资本的“筹码”。相较于城市知识女性，她们的命运似乎被深重的悲剧所笼罩。城市知识女性能够获得知识的滋养，其背后必定有着基本的受教育条件支撑，至少在家庭环境与经济条件方面具备一定优越性，这使得她们在人生道路上拥有更多选择的机会。然而，乡村女性的境遇却截然不同。她们不仅要肩负起因经济贫困所带来的沉重物质压力，在城市中为了微薄的收入从事着高强度、低回报的工作，生活极度艰辛；还要默默忍受着乡村文化长期笼罩下蒙昧无知所造成的精神枷锁。在乡村文化的固有观念束缚下，她们在面对新环境、新观念时，内心充满矛盾与挣扎，这进一步加剧了她们精神上的痛苦。因此，乡村女性常常沦为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双重悲剧的承担者。

乡村女性悲剧为题材的小说屡见不鲜，但在《花与梦》中关于这些女性悲剧的书写极具批判性。一方面，在商品经济的强烈冲击下，乡村女性成为了时代浪潮中的牺牲品。商品经济的逐利性使得她们在城市中难以找到立足之地，只能被迫以牺牲自身尊严的方式换取生存的可能。另一方面，尽管身处现代社会，她们却远远未能挣脱传统贞烈观念的桎梏。传统观念中对女性行为的严苛要求，四位主人公从小成长在贞洁观念及其浓厚的社会环境当中，而失身无疑是压倒她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卓嘎在未失身之前虽然经历父亲的残疾后辍学回归家庭承担着撑起一家的重担，换了一个又一个的工作，但是从未对此有过抱怨一直以坚强的态度面对一地鸡毛的生活，失身后却无法消化传统贞洁观念给自己带来的压力而后沉沦。同样小说中的央宗在未失身前对卓嘎她们所从事的工作很排斥，就算是换了一份又一份辛苦的工作收入微薄却心满意足，她觉得只要靠自己双手生活就有意义生活就有盼头，并且想要攒够房租，就离开卓嘎她们的出租屋。从未想要踏入这份行业，而失身后心理防线崩溃，开始踏入了该行业。这深刻体现了传统贞节观念与城市资本对乡村女性的双重摧残。

1.3 命运无奈：无法挣脱的悲剧宿命

悲剧感正如崇高感一样，宏大壮观的形象逼使我们感到自己的无力和微小……而在悲剧感中，这种力量呈现为命运[2]。小说中从她们进入这份特殊行业，以花命名后就似乎冥冥之中注定了她们的命运，就像是绚烂夺目的花儿终将逃不过枯萎的结局，整篇小说笼罩着悲剧的宿命感。明明她们坚强且善良美好，正值花一样的青春，但好像跟命运跟她们开了天大的玩笑一样。总会卷入似乎早已被命运安排的轨道当中而后沉沦，在命运面前她们是如此的微小而又脆弱。小说中有多处写到将所遇到的处境归于命运，央宗卓嘎受到侵犯后都会将自己的遭遇归结为命运。正如小说里央宗说的“我们摆脱不了命运像擦不掉额头上的皱纹，怪就只能管我天生就命不好一样。”她们生来就好像注定被命运安排在了沉沦的轨道中，卓嘎从小家中父亲遭遇重伤后辍学承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央宗从小就失去父母而后被带到城市当起了保姆却遭遇误会，小莉母亲去世后不受继母待见，宗西虽为四人当中条件最好的一位却早恋意外怀孕后而后打胎遭受异样眼光。尤为令人痛心的是，卓嘎患病后，一心想要收手回乡。可命运对这个苦命人没有丝毫怜悯，她被查出重病，必须接受手术。手术之后，卓嘎再也没能回到那片有着父母与弟弟，令她日思夜想的故土，徒留无尽的遗憾。在命运的洪流中，她们渺小得微不足道，根本无力反抗。

2 《花与梦》的叙事策略探究

2.1 隐秘叙事声音：作者立场的微妙表达

叙事声音是叙事作品以故事讲述所透露出的叙述人对事物的特定认识、立场观点和情感态度[3]。央宗在描绘从事特殊职业的四位女性时，除了对她们身体物化，更多其叙事声音饱含对人性本善的笃定认识。她站在理解与尊重的立场，打破大众对这类职业群体的刻板偏见。通过展现她们在鱼龙混杂环境中未被磨灭的美好品质，如对央宗亲姐妹般的劝告，对生病卓嘎的悉心照顾，央宗被侵犯后对卓嘎毫无怨言且倾囊相助，央

宗传达出对这些边缘女性的深切同情。她认为这些女性不应被职业标签束缚，她们有着复杂而高尚的灵魂，花一般的年纪却承受着远超常人的压力，这是对社会不公与偏见的无声控诉，表达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以及对人性美好一面的赞颂。与之对比，拉先加在小说《我是羊卓雍措中的一条鱼》塑造乡村进城女性邦拉时，受传统性别观念影响。将邦拉进城动机设定为追随偶像，呈现“傻白甜”形象，反映出对女性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片面认知。邦拉爱情梦碎、失去天珠并遭遇车祸离世，拉先加的叙事声音暗示女性在男性主导社会下的无力与被动，延续了传统叙事中女性悲剧形象。例如在部分乡村女性进城小说中，男性作家倾向于将女性描绘成依赖男性、缺乏自主意识的角色，而女性作家则更注重展现女性的坚韧与挣扎，这种叙事声音的差异鲜明体现了不同作者的性别立场与观念。

2.2 叙事结构：突破传统的创新呈现

2.2.1 碎片化叙事线

在《花与梦》里，作者果断摒弃传统线性叙事模式，将每位主人公的经历拆解成零碎片段，故意不向读者透露清晰时间脉络，读者唯有深入研读文本，反复挖掘细节，才能拼凑出完整故事时间线。起初，故事聚焦于卓嘎，讲述她进城求职，却不幸被朋友欺骗而失身，情节到此暂告一段落。紧接着，场景瞬间转换，目光投向在城中当保姆的央宗。央宗在宗西家辛勤工作，虽说解决了食宿问题，但始终未获报酬，还遭人误会偷窃，无奈离开。在叙述央宗这段经历时，作者运用插叙手法穿插了过去的的时间线，回溯过去，交代央宗来到宗西家当保姆的缘由。卓嘎与央宗的故事看似毫无关联，直至卓嘎将央宗接入出租屋，她们的命运才真正交织在一起，之后她们一同在歌厅工作。期间，作者频繁运用插叙，揭示宗西小莉卓嘎踏入特殊行业的背后原因，最终以卓嘎病逝为整个故事画上句号。整个故事在不同人物间频繁切换，像卓嘎的经历讲完后，便开启央宗的故事。而这样的叙事方式制造出悬念与惊喜，牢牢抓住了读者注意力。在《花与梦》中，这种叙事方式契合故事中人物复杂多变的命运轨迹，让读者在跳跃的情节中体会命运无常。不同人物故事线交织，全方位、多角度呈现故事背景与社会环境，使小说反映的社会现实更立体、全面。非线性叙事还给予读者更大解读空间，鼓励读者依据自身理解与生活经验，挖掘故事深层含义，极大增强了作品的开放性与多元性。

同时，小说精心设置关键信息缺口，有力推动读者进行叙事考古。丰富了故事层次，不同时间、人物经历相互交错，避免故事平淡无奇，为读者带来新奇且独特的阅读体验，深刻展现小说叙事结构的精巧复杂，助力主题表达，让读者对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与人性困境有更为深刻、透彻的认识。

2.2.2 突破传统的结局

在文学作品的创作范畴中，传统小说结局模式多遵循矛盾从产生至化解的线性路径，最终导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定式，以此给予读者情感抚慰与道德层面的圆满认知。然而，《花与梦》却大胆背离这一传统范式。小说中，致使卓嘎陷入悲剧命运深渊的关键人物“布珠”，不仅未遭受任何惩处，反而机缘巧合遁入佛门；反观卓嘎，却深陷医院病榻，在为筹措救命资金而焦虑万分的同时，还为无力支撑家庭生计而忧心忡忡。这种鲜明的命运反差，以极为深刻的笔触将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无奈与荒诞展现得淋漓尽致，构成了对现实世界辛辣且有力的反讽，无情地揭开了生活温情表象下隐藏的真实面目，深刻揭示出命运无常、世道不公的残酷现实。从文学创作的理论维度审视，《花与梦》这种突破传统的结局模式具有多方面显著优势。在真实感构建上，由于现实生活并非理想化地遵循善恶因果律，诸多无奈与不公客观存在，该小说以如此结局高度契合现实本真状态，能使读者在阅读进程中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深切体悟到生活的复杂多面与残酷本质。在主题深化层面，借由卓嘎与“布珠”全然不同的命运轨迹，有力地批判了社会的阴暗角落，有效促使读者深度反思人性、道德以及社会现实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而深度挖掘故事背后潜藏的深层次社会问题。从作品影响力角度而言，与大团圆结局所带来的即时情感满足不同，这种悲剧结局在读者合上书本后，仍能长时间地激发其对故事的深度回味与思考，有力地推动读者对生活、命运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探讨，极大地提升了作品的艺术价值与社会影响力。

3 结论

通过对次仁央吉小说《花与梦》的深入研究，我们清晰地看到小说从悲剧性与叙事策略两方面展现出独特魅力。在悲剧性塑造上，精准刻画乡村女性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多重困境，深刻揭示传统与现代交织下对女性的压迫，使人物命运悲剧契合经典悲剧范式。叙事策略层面，隐秘叙事声音、碎片化叙事线及突破传统的结局，共同强化了小说对现实荒诞的呈现与社会问题的批判。《花与梦》不仅为我们呈现了特定群体的悲剧命运，更借助巧妙叙事，引导读者深入思考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未来，期望更多学者关注此类题材小说，进一步挖掘文学作品在反映社会变迁与人性挣扎方面的深度与广度，推动文学研究在这一领域不断发展与创新。

参考文献

- [1] 查尔斯·霍顿·库利. 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 [M].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5: 01. 318.
- [2] 张琼. 理想、崇高与命运——浅析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中的悲剧思想 [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2, 6(05): 173-176.
- [3] 任现品. 论当代小说中叙事声音的着色功能——以《创业史》与《白鹿原》为例证 [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25(01): 61-65.